

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 及墓主身份的分析

王志高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 江苏南京 210004)

王 俊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 安徽马鞍山 243000)

The tomb excavated in 1996 is one of Zhu Ran family tombs and just as important as Zhu Ran tomb. After analyzed these two tombs structures, tomb bricks, funeral objects, and the locations within graveyard, the paper considered the 1996 tomb belonged to Zhu Ran's foster father——Zhu Zhi, who was buried prior to Zhu Ran. The paper further concluded that other high rank tombs within Wu Period in Caishi area, Ma'anshan City, which surely includes Zhu Ran family tombs, in some way related to Sun Che, Sun Xiu Mausoleums buried at Niuzhu, and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mausoleum section.

Key Words: Ma'anshan Zhu Ran Tomb Zhu Ran Family Tombs Wu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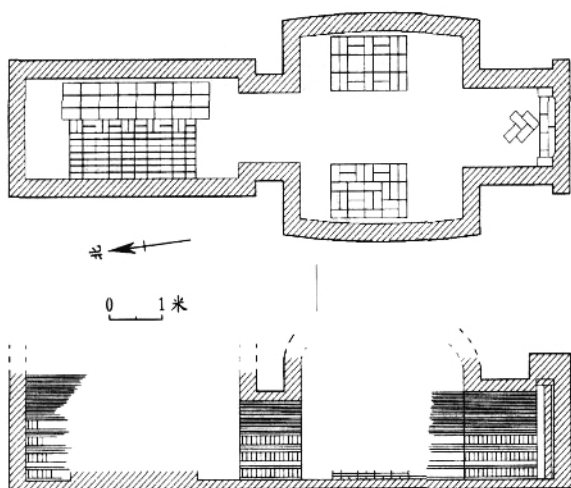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1996年发掘的朱然家族墓是一座与朱然墓同样重要的孙吴墓葬。本文对两墓的形制结构、墓砖、出土遗物及在墓地内的排葬次序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朱然家族墓时代比朱然墓早,墓主可能是朱然养父朱治。文章进而认为包括朱然家族诸墓在内的今马鞍山市采石周围地区发现的其他高等级大型孙吴贵族墓颇疑与葬于牛渚的孙策、孙休二陵有关,是这个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马鞍山 朱然墓 朱然家族墓 孙吴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南麓的一个小土岗上发掘了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之墓,朱然墓是迄今为止墓主身份明确、地位最高的孙吴贵族墓^[1]。时隔12年后的1996年9月,当地文物部门在朱然文物陈列馆扩建工程中,又在朱然墓前方发现4座同时代的砖室墓,其中M1规模最大,砖室全长超过朱然墓,被公认属朱然家族墓^[2]。然关于此墓的具体年代和墓主身份,自发掘之日起,一直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墓主是朱然之子施绩,施绩卒于孙吴晚期^[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墓主是朱然养父朱治,朱治卒于孙吴早年^[4]。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兹就其具体时代和墓主身份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显而易见,分析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比较朱然家族墓与朱然墓的相对早晚。若两墓早晚关系确定,则墓主身份势将迎刃而解。据史籍记载,在所涉及的3个历史人物中,朱治卒于黄武三年(224年),朱然卒于赤乌十二年(249年),施绩卒于建衡二年(270年)^[5]。朱治、施绩卒年相差40余年,与朱然比较则仅相隔20余年。同时,由于孙吴时期的纪年墓葬材料不多,本地区可堪比较的典型墓例十分有限。要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墓葬年代中进行取舍,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从考古发现看,朱然墓属合葬墓,其前、后室各置一具黑漆木棺,朱然家族墓从后室铺设的砖砌棺床推断也



图一// 朱然家族墓平面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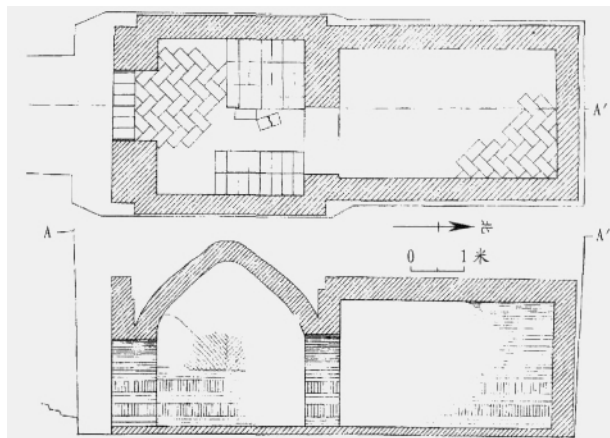
是合葬墓。由于合葬的两人入葬有先后,墓内各自所属的随葬遗物本身还存在或长或短的早晚差别,这又增添了从出土遗物方面区别墓葬相对早晚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据两墓形制结构、出土遗物,尤其是葬地茆位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对其相对早晚进行界定。

从墓葬的形制结构观察,朱然墓与朱然家族墓皆为平面呈“吕”字形的双室墓,均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等部分构成。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封门墙内、甬道前端设置一道石门,前室顶部为“四边券进式”穹隆顶(图一);而前者无石门,前室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图二)。石门本身可能不具备断代的意义,仅与墓葬的等级有关。已经发掘的长江下游江苏、安徽等省的孙吴、西晋时期墓葬中,墓内设置石门并不多见,除朱然家族墓外,只见于南京上坊孙吴墓^[6]、马鞍山宋山孙吴墓^[7]、宜兴周墓墩西晋 M1^[8]和 M4^[9]等大型贵族墓。它们的砖室全长都在 10 米以上,超过了朱然墓的规模,可证石门是墓主较高身份地位的象征。换言之,从墓葬规模及墓内石门设置的情况看,朱然家族墓墓主的身份地位要比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高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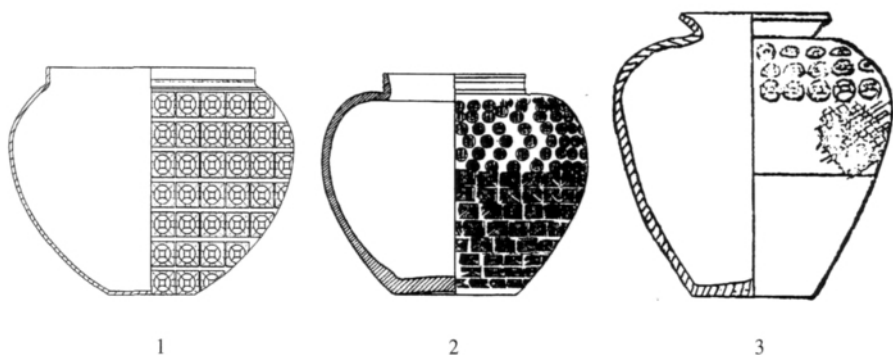
再看结顶方法的差异。众所周知,“四边券进式”穹隆顶是东汉以来的传统墓顶结构,在马鞍山市地区一直沿用至东晋时期。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四隅券进式”穹隆顶是一种新兴的技术相对更为复杂先进的墓顶结构,最早发现于河南南阳第二化工厂 21 号画像石墓^[10]和邢营 M2^[11]等东汉晚期墓。至孙吴早期,已影响到长江中游的湖北鄂州地区,如鄂州 M2215 前室即为“四隅券进式”

穹隆顶^[11],但为数不多。而在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纪年墓例即为赤乌十二年(249 年)的朱然墓,主要流行于孙吴中期以降。虽然这两种结顶方法在南京、马鞍山等地的孙吴、西晋时期墓葬中皆有发现,但是比较而言,墓葬规模较大或墓主身份较高者,如上坊中下村孙吴墓、上坊棱角山天册元年(275 年)墓^[13]、宜兴周墓墩 M1 和 M4、板桥石闸湖西晋墓^[14]等,多用这种新兴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上坊中下村孙吴墓据分析是一座孙吴宗室王陵,棱角山天册元年(275 年)墓据出土砖铭,墓主可能与“臧侯”有关,周墓墩 M1 和 M4 墓主属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之称的义兴豪族周氏,石闸湖西晋墓墓主是大中大夫、高平太守侯府君,都属地位较高的宗室或贵族;而使用传统的“四边券进式”穹隆顶结构的墓葬似乎墓主地位明显较低,如南京幕府山孙吴五凤元年(254 年)M2、江宁索墅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墓^[15],前者墓主为无职的大男黄甫,后者墓主为无职的江乘人朱氏。因此,我们怀疑长江下游地区孙吴中期以降,这种新兴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代表着一种官式墓葬建筑类型,流行于较高等级的宗室和贵族。“四边券进式”穹隆顶则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墓葬建筑类型,多使用于较低等级的一般贵族和普通民众。朱然家族墓从前析墓葬的规模和石门的设置看,墓主身份要高于朱然,但其前室墓顶仍使用传统的“四边券进式”穹隆顶,那就只能说明其时代早于流行“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结构的孙吴中期。

需要进行分析的还有两墓的墓砖。朱然墓墓砖有两种:一种质量较高,为特制大砖,约占总数的 80%,在其侧面模印篆文吉语“富且贵,至万世”,句首、句中、句尾还以钱纹相隔,在其端面模印篆文吉语“富贵万世”或“富且贵”;还有一种为



图二// 朱然墓平面剖面图



图三// 马鞍山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钱纹陶瓷器

1. 朱然家族墓出土 2. 朱然墓出土 3. 郎溪东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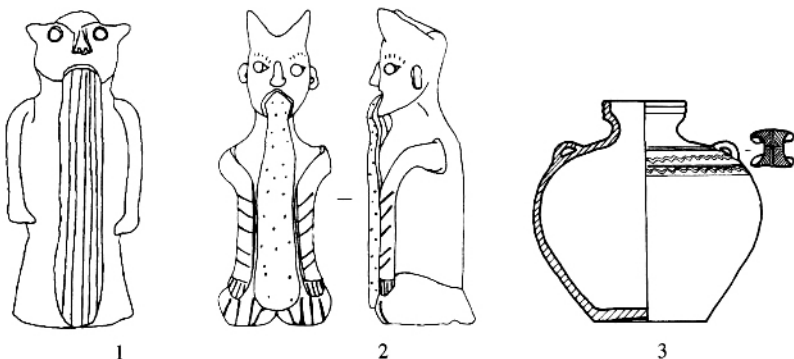
早年遭严重盗扰,出土遗物现状远不能反映当初入葬时的全貌。其二,此墓是一座合葬墓,如果后葬者距墓葬的修建时间较长,则出土遗物时代就要相对晚于墓葬时代。故对此类合葬墓的断代须格外慎重,不能简单地把随葬品时代等同于墓葬时代,而应该全面分

析它的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然后综合考虑它的具体时代。其三,从方法论上看,我们可以根据若干墓例总结一般规律,但所得出的一般规律,却未必适用于所有墓例。以朱然家族墓为例,有研究者根据马鞍山地区孙吴中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中青瓷器逐渐增多、陶器逐渐减少的趋势,以及朱然墓中出土多件陶器,朱然家族墓中未见一件陶器的情况,得出朱然家族墓晚于朱然墓的结论。其实,这样的陶瓷器数量变化趋势也同样见于南京地区的同时期墓葬,却不能因此认为所有墓葬必须符合这一趋势。有些墓葬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如南京中华门外古长干里一座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砖室墓内,除一件陶灶、堆塑罐外,均为青瓷器^[18]。而江宁周岗一座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墓中,瓷器仅占6件,陶器数量则达到16件^[19]。其四,选择进行分析比较的遗物须是典型器。所谓典型器就是出土数量较多,器形及装饰变化比较明显的器类。朱然家族墓中出土有类型较多的青瓷模型明器,但这些模型明器均属手工控制,器形变化的偶然性较大,故不宜作为典型器进行分析。同样不宜作为典

普通小砖,数量较少,主要用于挡土墙上部、墓顶和加固的砖垛。朱然家族墓墓砖分三类:前两类为普通长方形和楔形小砖,数量占绝大多数,砖上多模印钱纹、对角线纹、同心圆纹和几何纹等;第三类为与朱然墓相近的特制大砖,砖的侧面和端面也模印有篆文吉语“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等铭文,但其数量极少,仅在甬道的券顶、前室左前壁1.83米处和后室左侧残存的券顶几处发现,且质量较差,难以取下完整的墓砖。考古发现证明,这种篆文吉语大砖不见于本地区孙吴早期的独家墩大墓^[16]。除朱然墓、朱然家族墓外,还见于宋山大墓、采石翠螺山墓等孙吴中晚期墓葬,被推测是马鞍山地区孙吴上层贵族墓葬特有的一种墓砖^[17]。然而朱然家族墓墓葬主体却为普通长方形和楔形小砖砌建,砖上模印的各类花纹见于独家墩三国早期墓,亦见于本地区其他一般孙吴、西晋墓葬。如果其时代与朱然墓相当或晚于朱然墓,那么这样一座高等级的墓葬主体,也应该像朱然墓、宋山大墓一样,使用为当时上层贵族墓特制的模印吉语的大砖,但事实上,此墓只有部分墓顶及接近券顶的墓壁几处发现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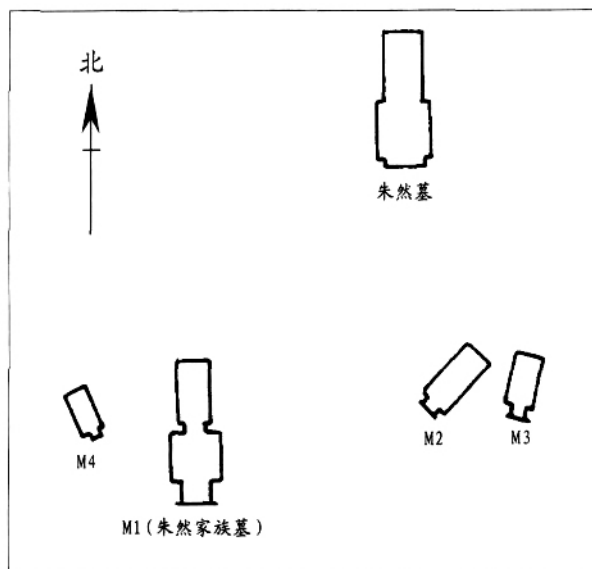
量这种特制大砖。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朱然家族墓的时代早于朱然墓,当时还未开始烧制这类特殊大砖,故其主体使用了一般的纹样小砖。但至孙吴中晚期,此墓或因被盗,或因自然坍塌,部分墓壁和墓顶经过了修补,修补的部分自然使用较后上层贵族墓方始流行的吉语大砖。

关于出土遗物,我们先作几点说明:其一,朱然家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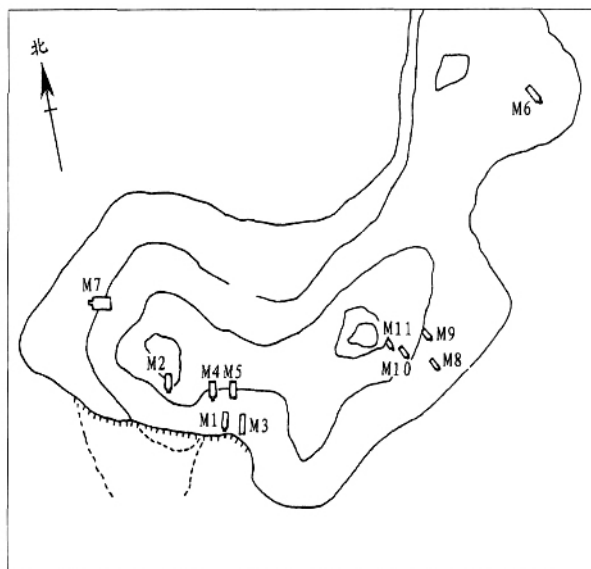


图四// 马鞍山及其邻近地区孙吴早期墓出土的瓷器

1. 朱然家族墓出土的镇墓俑 2. 全椒卜集孙吴墓出土的镇墓俑 3. 佳山孙吴墓出土的盘口壶



图五// 朱然家族墓地平面分布图



图六// 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平面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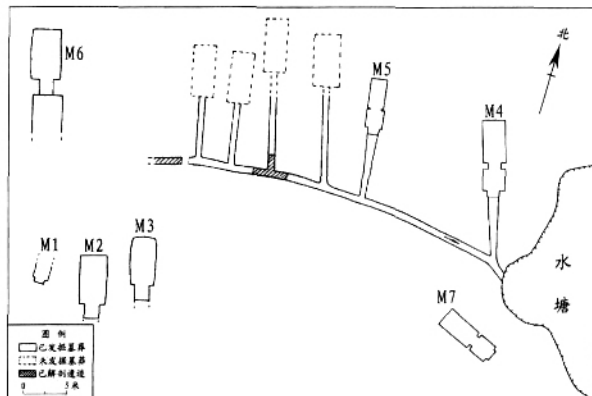
型器的还有墓中出土的青瓷羊形烛台,同类器以往仅见于南京清凉山孙吴甘露元年(265年)墓^[20]和西岗西晋墓^[21]等个别墓葬,还难以总结其器形变化的规律,不能将它们外观上的大体相似简单地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产品。

朱然家族墓中大多数遗物的时代虽难以给出十分明确的断限,但有些器物 and 现象却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是一件青瓷钱纹大罐,其外壁上下满身拍印7层四出“大泉五十”钱纹。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类钱纹陶瓷器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期至吴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其器形和装饰早晚演变的规律是:器体从上到下拍印钱纹的层数由多到少,下腹部的几何纹则逐步向上发展到腹中部,甚至到上腹部,而所饰的钱纹则由早期的拍印有力、图案清晰到逐渐模糊难辨,或为无文钱纹^[22]。马鞍山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钱纹陶瓷器与这一规律相吻合。如孙吴中期朱然墓出土的一件釉陶钱纹罐,上腹拍印6层钱纹,钱纹已模糊,下腹拍印蕉叶纹。郎溪一座东晋墓中出土的一件釉陶钱纹罐,腹部拍印3层无文钱纹和斜方格纹,斜方格纹已侵至上腹部(图三)^[23]。朱然家族墓出土的钱纹罐通体拍印“大泉五十”钱纹,未见几何纹样,属于钱纹陶瓷器的早期式样。

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朱然家族墓出土的瓷器中,除一件羊形烛台胎釉结合牢固,为典型越窑瓷器精品外,余以猪圈、马圈、厕圈和长舌及地的镇墓俑等为代表的大多数瓷器均青灰釉,质量较差,釉层大部分剥落。这类瓷器明显不属江浙地区窑口产品,与本地区朱然墓、宋山大墓等孙吴中晚期墓出

土的越窑系瓷器有着天壤之别,而与佳山孙吴墓出土的瓷器同属一类^[24]。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它们与长江中游鄂州等地的孙吴墓葬中出土瓷器的相似性,认为有可能就是来自长江中游的产品^[25]。特别是朱然家族墓中出土的长舌及地的镇墓俑,佳山孙吴墓出土的穿山甲、人面兽身镇墓俑^[26]等,更是仅见于长江中游地区,而绝不见于近旁的孙吴都城建业地区的孙吴墓葬。为什么马鞍山地区的孙吴墓葬中会出现上述两个不同系统的瓷器类型,它们之间会不会有时代上的差异?

这个问题必须从孙吴早期定都的历史说起。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孙权将治所由公安(今湖北公安)迁徙至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直到孙权已正式称帝的黄龙元年(229年)九月,他才把都城迁至长江下游的建业(今南京)。武昌作为孙吴早期的政治中心达8年之久,这期间其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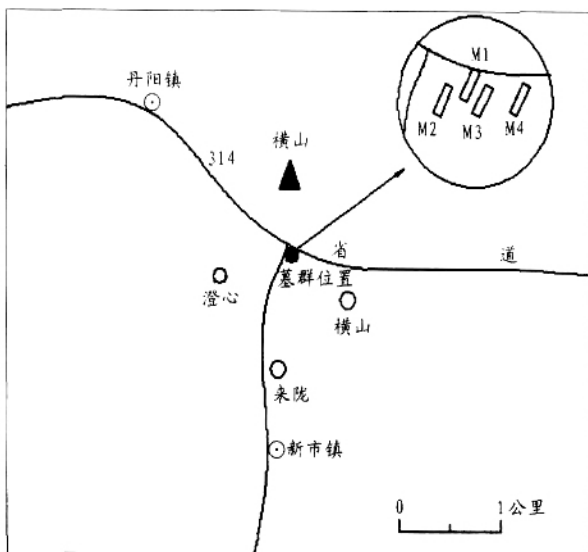


图七// 南京仙鹤观孙吴家族墓地和东晋高崧家族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丧葬文化必然向辖域内的其他地区输出,马鞍山地区出土的这部分鄂州系统的瓷器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来自长江中游或受其影响。而当迁都至建业之后,马鞍山地区作为京畿的首善之区,其经济、文化必然主要在建业的辐射范围内。概言之,以朱然家族墓、佳山孙吴墓为代表的孙吴墓中出土的鄂州系统瓷器,其时代可能多在迁都建业之前的孙吴早期。而以朱然墓、宋山大墓为代表的孙吴墓中出土的江浙系统瓷器,其时代多在迁都建业之后的孙吴中晚期。佳山孙吴墓还出土一件青瓷盘口壶,盘口小而浅,肩饰水波纹,其器形和装饰都极少见于长江下游地区孙吴中晚期的同类瓷器,也是该墓时代较早的证据之一。此外,同样出土长舌下垂的青瓷镇墓俑的安徽全椒卜集孙吴墓,墓中发现的香熏、仓、洗、钵等瓷器均素面,不见稍后流行的菱形纹、网格纹、联珠纹等,也应该是一座孙吴早期墓(图四)^[27]。

从两墓在茔地所处的位置,也能判断它们之间的相对早晚。这一墓地为南向,发现的5座墓葬分前后两排,朱然墓位于后排的左(东)侧,前排则有4座墓葬由西向东有序排列,依次编号为M4、M1、M2、M3,其中M1就是本文所析的朱然家族墓。显然,这一墓地经过精心的规划,各墓按照一定的原则落葬在相应的位置上,墓主毫无疑问同属一个家族。在这个家族墓地内,朱然墓独属后排,似乎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它虽与前排以M1为中心的4座墓葬相关连,但所联系的层次显然没有这4座墓葬之间那么密切。换言之,朱然墓和朱然家族墓(M1)是这个家族墓地的两个中心(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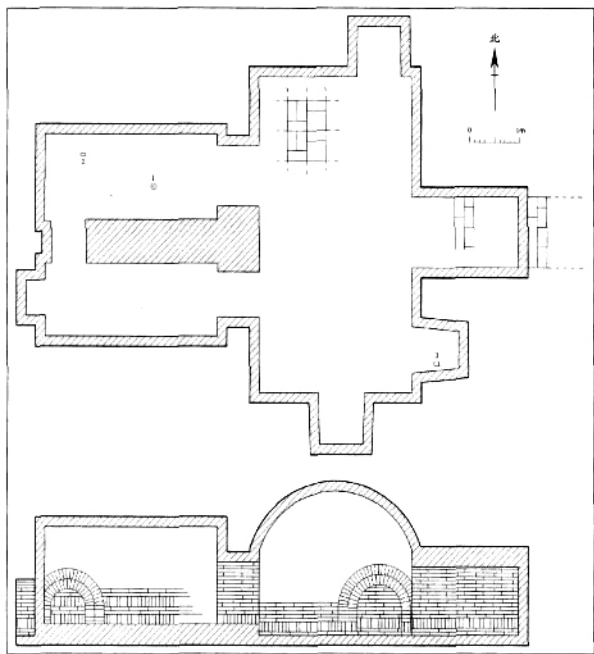
六朝时期家族墓地内各墓之排葬次序,尊者居前、居后并不固定。以南京地区为例,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的3座墓葬中,后排的6号墓时代早,地位高,似是尊者居后^[28]。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自西向东划为4个不同墓区,南麓西段和中段两个墓区发现的8座墓葬又可划分为前后几排,前排时代早,则是尊者居前。但以左、右论,则无论是世家大族墓地,还是聚葬的东晋、南朝帝王陵墓,则以尊者居右多见。所谓居右,是相对于墓葬方向而言。若墓地南向,则以西为尊。反之,则以东为尊。如老虎山东晋颜氏家族墓地,墓地南向,最西是颜谦夫妇合葬墓,其东是颜约墓,又东是颜琳墓,最东是颜镇之墓和五号墓。颜约是颜谦弟,颜琳乃颜谦、颜约之侄,尚右的规律十分明显。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的4个墓区,亦自西向东按时代



图八// 当涂新市镇来陇村南朝墓地位置及墓葬分布示意图

先后分布,实际上仍以右为尊。西麓的七号墓时代最早,为东晋早期墓,墓主可能是王彬兄王虞。南麓西段的王兴之、王丹虎、王闾之,再加上已毁的王彬墓,时代稍晚,葬于咸康、升平年间。南麓中段的王企之、王建之等墓时代又晚,葬于泰和年间。而夏金虎非王彬正室,又卒于更晚的太元十七年(392年),故葬于更远的东麓(图六)。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就前后两排而言,虽如前析为尊者居后,但实际上后排的6号墓居最西,前排的2号墓、3号墓在其前方的东侧,仍以右为尊,并且前排的这两座墓葬西侧的2号墓主是东晋中期的高崧夫妇,东侧的3号墓主被推测是卒葬于东晋晚期的高崧子高耆夫妇,亦以右为尊^[29]。仙鹤山孙吴家族墓地内已发掘或探明的6座墓葬,由西向东呈一行排列,墓前的共用排水系统愈向东愈深,最东侧的M4近旁便是排泄各墓积水的水塘,其时代最晚,故亦以右(西)为尊^[30](图七)。再看本地区当涂新市镇来陇村发现的南朝墓地,4座墓葬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者有M1和M4,其中前者在西,甬道中设木门,直棂假窗上有“凸”字形灯龕,相对时代较早。后者在东,后室棺床上铺石棺座,直棂假窗上设火焰形灯龕,相对时代较晚,亦以右者为尊(图八)^[31]。朱然家族墓位于朱然墓西南侧(即右前方)34.2米处,根据前述六朝家族墓地内尊者居右的一般规律,其时代要早于朱然墓,是这一家族墓地的祖墓。

总之,无论从墓葬的形制结构,从出土遗物,还是从墓葬在茔地的葬位看,朱然家族墓的时代都要比朱然墓早。



图九// 独家墩三国早期墓平面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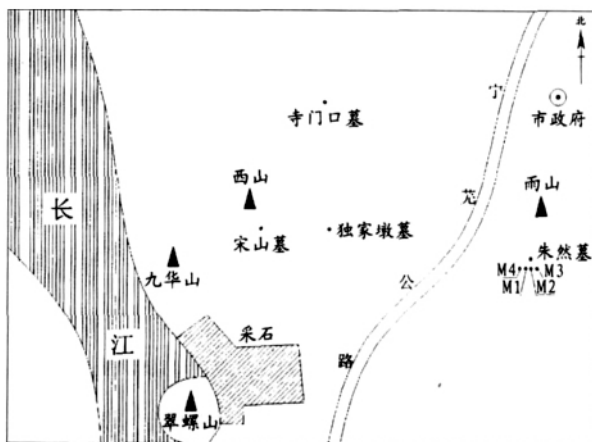
二

由前文分析已知,朱然家族墓较之朱然墓时代早,等级高,则其墓主非朱然养父朱治莫属。朱治,字君理,丹阳故鄣人。朱治与孙氏集团二代三主皆有较深的渊源关系。他早年追随孙坚四处征伐,立下汗马功劳。孙坚死后,朱治尽心辅佐孙策,力劝孙策平定江东。时孙策与移治曲阿(今镇江丹阳)的扬州刺史刘繇产生矛盾,但其母及弟孙权等家人仍寄住曲阿,为避免不测,朱治曾派人到曲阿迎其家人至历阳,一路“供奉辅护”,故与孙氏“甚有恩纪”。孙策死后,朱治又与张昭、周瑜等人尊奉孙权,委心服事,征讨夷越,佐定东南,是孙吴一朝重要的开国功臣。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受封吴王后,朱治被封毗陵侯。次年,又拜为安国将军,金印紫绶,徙封故鄣侯。不仅如此,史载孙权“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飧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觐”,所受殊荣,非同寻常。朱治对孙权于国有功、于家有恩,其墓葬规模、等级超过其子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墓则完全可以理解。

朱然,字义封,本姓施氏,系朱治姊之子。朱然年十三,朱治因为无子,乃表启孙策以朱然为嗣。后朱治陆续有才、纪、纬、万岁诸子,朱然乃有心归宗。《三国志》朱然本传载:朱治死后,“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今从朱然墓中出土的名刺上仍称“故鄣朱然”看,直到朱然死后,其归宗的愿望也没能实现。朱然之卒地,本传虽无明确记载,

但云“(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皆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孙权与朱然之间问疾和表疾的使者相望于道,不像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很可能就在都城建业。但朱然卒后既没有归葬故鄣朱氏故里^[32],也没有就近葬在都城建业近郊,而是移柩至与其为历官、封地^[33]似乎都没有联系的今马鞍山市雨山之原。这个问题,过去很让人费解。若笔者所考朱然家族墓墓主为朱治属实,则朱然归葬乃父墓次则于礼于情两相释然。至于朱治为何安葬此地,将是我们后文需要着重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这个墓地除朱然墓、朱然家族墓外,与朱然家族墓同居前排者还有3座早年遭严重毁损的小型砖室墓,其平面均呈“凸”字形,砖室全长皆不足5米(表一)。发掘者认为这“三座小墓的墓葬形制、墓砖规格与马鞍山地区已清理的西晋时期墓葬相同,应属西晋时期。但由于埋葬较浅,排列基本无序,应该不是朱然家族成员的墓葬。”实际上,无论是南京地区,还是马鞍山地区,单从墓砖规格是不能区别究竟是孙吴时期,还是西晋时期。况且,除M2出土1对银手镯外,各墓皆未发现随葬品,对墓葬的断代就更无从谈起。这三座墓葬也并非排列无序,而是呈向心状面朝朱然家族墓,与朱然家族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墓主推测也是朱然家族成员。据《三国志》朱治本传记载,除养子朱然外,朱治有四子,长子朱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此3座墓葬墓室狭小,仅能容纳1棺,为典型的单人葬,有可能即为早夭的朱纬、朱万岁之墓。朱纬、朱万岁虽然早夭,但与朱治的血缘关系



图十// 采石周围地区大型孙吴墓分布示意图

较之朱然更为亲密,故在葬地的安排上,作为嗣子的朱然独立置于后排左侧的茔位,而其亲子则左右相拥朱治而葬。由于M3东侧、南侧为曲廊所隔,其外围施工触及土层较浅,地下或埋有朱才、朱纪等其他朱然家族成员也未可知。

朱然之子朱绩虽嗣父爵,先后拜镇东将军、骠骑将军、上大将军、都护督、左大司马,可谓官高位重,却不可能与朱然葬于同一墓地。因为《三国志》朱绩本传记载,早在五凤年间(254~256年),朱绩已“表还为施氏”,算是代其父完成了归宗的遗愿,故《三国志》、《晋书》等的有关记载中都称为“施绩”,而不称“朱绩”。施绩既然已经归宗还复本姓,建衡二年(270年)四月卒后自当入葬施氏祖茔,绝无再葬其父朱然墓葬所在的朱氏祖茔之理。

施绩或朱然的本来籍贯《三国志》本传虽未有记载,但既然朱然为朱治姊之子,则一般情况下其籍当距故鄣不远。检之史籍与相关考古发现,《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载末帝孙皓时有吴兴人施但,《陈书》卷三十一载有施文庆者,为吴兴乌程人,南京象山出土的东晋王闳之墓志称其妻为“吴兴施氏”^[34],颇疑这三人与施绩同籍。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二云:“施淑女,山阳人施绩女也。”其后小注更明确记载:“施绩,吴兴人,孙皓时为骠骑将军,守西陵,今云山阳。恐女或出适,取夫家郡,不尔则乖。”^[35]吴兴乃孙皓于宝鼎元年(266年)分吴郡、丹杨九县新置之郡,治乌程县,正与故鄣相邻^[36]。又据1992年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出土的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记载,施氏生临贺王叔敖、沅陵王叔兴及宁远公主,其远祖即为吴将施绩^[37]。朱然的名声和影响远远超过施绩,但施氏墓志未及朱然,正是因为施绩复姓而被其后人尊为施氏之祖的缘故。

朱治、朱然、施绩等人的墓葬在后世地方文献中屡有记载。如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一载:朱治墓在归安县南十二里,施绩墓在归安县南十六里,朱纪墓在安吉县南五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七三《湖州府古迹考》载:“当阳侯施绩墓在(湖州)城南一十六里”;“三国吴将军朱纪墓在(安吉州)顺安乡”。《大清一统志》卷二二二《湖州府》载:“三国吴朱治墓、施绩墓在归安县南十六里。清同治《安吉县志》卷六更详载:‘吴毗陵侯、后封故鄣侯朱治墓在顺安乡姚坞。当阳侯、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在定福乡黄墓山。镇西将军朱琬墓在顺安乡姚坞。骠骑将军朱绩墓在定福乡黄墓山’^[38]。武骑校尉、领兵朱才墓在铜山乡朱墓岭。”不过,这些

记载都出自晚期地方文献,有宣扬地方名人之嫌疑,史料的可信性要大打折扣。朱然墓因为已在安徽马鞍山市发掘出土,已证其误,其他墓葬的位置也需要打个问号。

朱然家族墓墓主身份已如前析,很可能是朱然养父朱治。据《三国志》朱治本传记载,朱治长期执掌吴郡之政,晚年因“丹杨深地,颇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并“在故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224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这段文字虽未直接点明朱治卒亡之地,但从上下文意判断,大约是死在吴郡(今苏州)。现在的问题是,朱治既没有葬在他长期执政的卒亡之地吴郡,也没有就近归葬他的故乡故鄣,更没有葬在当时孙吴的政治中心武昌(今鄂州),而是长途移葬至与其历官、封地亦皆无联系的滨江之地今马鞍山地区,这就需要进行分析和讨论。

今马鞍山市及所辖当涂县境,在孙吴以前,大部分地区属丹阳县,其西南境据当涂龙山桥镇出土的凤凰三年(274年)孟买地券券文可知,地属芜湖县^[39]。朱然及其家族墓葬所在的今马鞍山市西北滨江的采石地区,古称牛渚,则可能先后属秣陵县和建业县^[40]。《后汉书·郡国志》载:“秣陵南有牛渚”,可以为证。其地“西接乌江,北连建业”;“与和州横江渡相对”^[41]。江岸有牛渚山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为自秦以来的一处重要津渡。山上不仅有驻军的牛渚营(后改为城),还有屯粮的牛渚屯,故有“采石之险甲于东南,其地南控楚疆,东络吴会,扼三江之襟要,溃江淮之腹心”之誉。可以说,在东汉末年至孙吴迁都建业之前,牛渚的军事战略地位不在建业之下。兴平二年(195年),孙策首先渡江占领牛渚营,由此转战东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一举平定江东^[42],牛渚也就成为孙吴江东基业的肇始之地。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奴客刺杀身亡。关于孙策葬地,有今苏州、无锡、镇江丹徒及浙江富阳等多说,未有定论。马鞍山市的文物工作者则根据地方文献及考古发现的线索,认为孙策可能葬于牛渚。1986年8月,今采石东北的雨山乡陶庄村独家墩曾经发掘一座大型东汉末年(或称三国早期)多室墓。砖室内长9.86、内宽7.78米,由封门墙、甬道、横前室、过道、并列双后室等部分构成,其中横前室东壁、南壁、北壁及右后室的西壁还各设一个耳室,双后室之间有过道相通(图九),其墓主被推测是有“英气杰济,猛锐冠世”之称的讨逆将军、吴侯孙策^[43]。按孙策之

表一// 朱然及其家族墓形制、规模比较一览表 (长度单位:米)

墓葬名称	墓向	平面形制	砖室全长	甬道长	墓室(长×宽)		时 代
					前室	四隅券进式穹隆顶,2.76×2.78	
朱然墓	180°	“吕”字形双室墓	8.7	0.82	后室	券顶,4.08×2.30	赤乌十二年 (249年)
朱然家族墓 (M1)	187°	“吕”字形双室墓	10.59	1.40	前室	四边券进式穹隆顶,3.22×3.28	
					后室	券顶,4.22×1.82	
M2	220°	“凸”字形单室墓	4.53	0.805	3.725×1.44		
M3	193°	“凸”字形单室墓	4.25	0.785	3.445×1.35		
M4	165°	“凸”字形单室墓	4.44	0.75	3.69×1.40		

卒亡之地,从《三国志》孙策本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以及注引《江表传》:“策归,复讨(陈)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以骑绝不能及……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的记载看,似乎是在丹徒的江边。当时孙策虽已占据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等江南诸郡,但包括丹徒在内的各地局势并不稳定,不仅有吴地旧军阀的残余势力,还有散居山岭、叛服无常的众多山越人。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如果孙策或其继任者孙权把有重兵把守、安全有所保障的孙氏转战江东新起点的牛渚作为他的终埋之地,就不是没有可能。就目前的有限材料,我们固然不能把独家墩大墓指认为追谥为长沙桓王的孙策王陵,但这座大墓及其周围包括朱然家族墓、朱然墓在内的其他孙吴早中期大型贵族墓葬的发现,则无疑为我们寻找有孙吴“首事之君”、“开国之主”之称的孙策之墓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

又据史料记载,牛渚旁还有陵口、东陵口、陵口戍的古地名。《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载:“苏峻乱起历阳,自率(祖)涣、(许)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江,次于陵口,与王师战,频捷。”《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纪十六》“咸和三年(328年)”条亦云:“是年正月‘丁未,苏峻帅祖涣、许柳等众二万人,济自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其后胡三省注曰:‘牛渚山,在今太平州当涂县北三十里,山下有矶,津渡之处,与和州横江渡相对。陵口,当在牛渚山东北,即东陵口也。’《大清一统志》卷八十四、《江南通志》卷三十五还记载,因陵口为江滨戍守处,其地又称‘陵口戍’。这几个地名,一般认为与吴景帝孙

休的定陵有关。孙休卒葬于永安七年(264年)。《二十五史补编》之清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卷一“陵口”条云:“苏峻济自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胡三省曰:在牛渚东北,亦江滨戍守处。今考吴景帝陵,在当涂县西北采石山。此云陵口,当以此为名也。”然民国《当涂县志·大事记》却载:“(建安)十九年(214年),吴侯权以鲁肃为横江将军,屯陵口。”其后小注云:“牛渚西北十五里,即思贤港。”按《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鲁肃传》仅载:“(建安)十九年(214年)(鲁肃)从权破皖城,转横江将军。”未见“屯陵口”的记录,不知民国《当涂县志》何据。如果这条记载有早期史料支持,那么说明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之前牛渚附近已有“陵口”的地名存在了。而在建安年间的江南,能够称陵的只有孙坚和孙策。孙坚《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已明确记载“还葬曲阿”,那就只能是孙策了。过去,我们读史可以理解末帝孙皓因为别支继位而未将先帝孙休葬入建业蒋陵的作法,但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牛渚作为景帝孙休的陵地。现在看来,若其地早有长沙桓王孙策的陵墓,孙休再葬此地就不失为一种较合理的解释。

作为辅佐孙氏二代三主的开国勋臣,在朱治死后把他陪葬于旧主孙策陵旁,可以说是孙权对朱治一生业绩的充分肯定,也是能够给予他的一种崇高政治荣宠。不仅如此,包括朱然家族诸墓在内的今马鞍山市采石周围地区发现的其他高等级大型孙吴贵族墓颇疑都与葬于牛渚的孙策、孙休二陵有关,是这个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十)。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2][17]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

-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 [3] 栗中斌《谈朱然家族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 [4] 王俊《谈朱然家族墓》,《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另据笔者了解,南京大学历史系蒋赞初先生和已仙逝的李蔚然先生亦持此观点,但未有专文讨论。
- [5]《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附施绩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3~1309页。以下凡参引本传者,不另注。
- [6]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待刊。
- [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发掘者认为此墓有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但此墓的规模和等级尚不及南京上坊孙吴大墓,而后者仅被推定为孙吴晚期的一座宗室王陵,故这一推论的依据目前似显不足,然因其形制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近同,故属孙吴宗室墓应无疑问。对这一问题,笔者拟将作专文探讨。
- [8]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 [9] 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
- [10]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第二化工厂21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 [11]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邢营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 [12]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鄂州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
- [1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 [14]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 [1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考古》1987年第7期。
- [16]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马鞍山市独家墩三国早期墓发掘简报》,待刊。
- [1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待刊。
- [18]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江宁区周岗镇尚义采石场西晋纪年墓》,辑之《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9]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
- [20] 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第3期。
- [21] 贺云翱等《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东亚考古论坛》第二辑,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6年。
- [22] 宋永祥《安徽郎溪的三座晋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23] 关于马鞍山地区出土六朝瓷器胎、釉、造型等视觉效果比较,可以参见王俊主编《马鞍山文物聚珍》,文物出版社2006年。
- [24] [29] 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75、176、112~114页;韦正《马鞍山六朝墓葬片论》,待刊稿。
- [2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市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第5期。
- [26] 滁州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全椒县卜集东吴砖室墓》,《考古》1997年第5期。
- [27]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 [28]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仙鹤山孙吴、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1期。
- [29] 安徽省当涂县文物事业管理所等《安徽当涂新市来陇村南朝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 [30] 故鄣县始建于秦,称鄣县。汉因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改曰故鄣。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属故鄣郡改为丹阳郡。故鄣县幅员辽阔,大致包括今浙江安吉县全境、长兴县西南一部和安徽省广德县全境、郎溪县一部。
- [31] 根据《三国志》朱然本传的线索,朱然历官或驻军之地有余姚、山阴、大坞、三关屯、临川、临沮、江陵、宜都、石阳、兖州、木且中等,先后封爵西安乡侯、永安侯、当阳侯。
- [3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 [33]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十三亦有完全相同之记载,应为转录。又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三十引《搜神记》亦云“吴兴施绩”。
- [34]《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注引孙皓诏书云:“今吴郡阳羨、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第1166页。
- [35] 董理《陈临贺王国太妃墓志铭考释》,《文博》2001年第5期。
- [36] 清乾隆《安吉州志》亦载:朱治墓在顺安乡姚坞。按乌程、归安为湖州附郭二县,乌程偏府治西北,归安偏府治东南。
- [37] 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当涂县发现东吴晚期地券》,《文物》1987年第4期。
- [38]《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载: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 [39]《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宣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684页。
- [40]《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
- [41] 李敏、郎俊、吴志兴《马鞍山独家墩汉末墓与宋山东吴墓墓主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9日。